



新聞革命

廣州新聞出版界革命聯合委員會編印

前 言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复慨而慷”。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地区新闻界的革命群众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复，把被陶铸等一小撮走资派牢固盘踞的新闻“阎王殿”砸个稀巴烂，宣判了资产阶级新闻黑线的死刑，宣判了陶铸苦心经营的反革命舆论工具的彻底毁灭。

刘邓黑司令部的悍将——陶铸，为了在中南地区复辟资本主义，无时无刻不在大力制造反革命舆论，他通过安插在新闻、出版界的死党，牢牢盘踞着报纸、广播、电视、出版等宣传阵地，大肆贩卖封、资、修黑货。他们一伙，疯狂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面对工农兵；他们一伙，叫嚣要“为一切读者、听众服务，兜售‘全民牌’的黑货；他们一伙，打着“知识性、趣味性、文娱性”的幌子，以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靡靡之音去腐蚀革命群众，“寓”资本主义复辟于“谈天说地之中”；他们一伙，热衷于暴露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明刀真枪地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一伙，利用党的宣传阵地进行种种罪恶活动，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流毒极广。

我们，广州地区新闻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英明号召下，组成了浩浩荡荡的

革命批判大军，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揭露陶铸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广州新闻工作的黑指示，彻底批判他们反动透顶的新闻观点和新闻路线，清算他们在新闻工作中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广州新闻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明确认识：只有彻底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黑线批深批透，并彻底肃清其流毒，才能够牢固有效地树立毛主席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的绝对权威，促进新闻干部队伍的革命化，把被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新闻阵地重新夺回无产阶级的手里来。

我们广州新闻出版革命联合委员会编印出版的这份《新闻革命》，就是要肩负起这个重大的任务，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刊登新闻出版界和广大革命工农兵群众的文章，向资产阶级新闻黑线猛烈开火。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对新闻黑线的批判也要发动和进行一场革命的人民战争。新闻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广大工农兵革命同志们，让我们以最高度的政治热情，拿起战斗的笔杆，投入这项工作，为新闻界的大批判，为新闻界斗批改作出贡献，把广州的新闻出版事业办成传播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红色阵地。

彻底批判陶家新闻黑店的反动理论

广州日报红旗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在新闻界的代理人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等，为了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多年以来制定、散布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黑货，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新闻理论，妄图用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纲领蛊惑人心，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新闻工具蜕化为资产阶级新闻工具，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制造舆论。

陶家新闻黑店是刘少奇黑司令部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急先锋。长期以来，陶铸及其忠实走狗王匡等人，曾经系统地移植、推广刘少奇之流的修正主义新闻黑货，让它在广东新闻界开黑花、结毒果。他们还一向以“革新家”、“闯将”的姿态出现，对修正主义新闻理

论极尽“发挥”之能事，抛出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新闻观点，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之流的反革命面目，揭穿了他们篡夺新闻阵地进行复辟资本主义活动的罪恶行径，把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理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看清它的反动本质。

“读者需要论”为谁需要

刘少奇、陶铸之流经常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姿态，反复鼓吹党的新闻事业要为“读者服务”、“满足读者需要”、“面向群众”、“面向各个阶级”“新闻要有普遍兴趣”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更有一句“名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论那一个角落都是报纸活动的领域，报纸要一视同仁，博爱。”

上述种种，说穿了都不过是“全民新闻”、“全民报纸”的谬论，是刘少奇的黑《修养》和陶铸的“我们大家都是十派，叫中国人民派”的反动政治纲领在新闻工作中的应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读者”是划分为阶级的，他们的兴趣也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要消灭剥削制度，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则要维护剥削制度。在这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共同兴趣可言。一张报纸又怎么能同时满足他们的需要呢？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报纸从来就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它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为资产阶级服务；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报纸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占领，彼此进行的是一场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生死搏斗，那种鼓吹为“读者服务”和“满足各种人的需要”的论调，完全是欺人之谈！

刘少奇、陶铸之流打出的是“超阶级”的旗号，但他们干的却是资产阶级的梦寐以求的事情。例如，刘少奇在多次的黑报告、黑指示中，就公开把“自由资产阶级”、“全国人”、“蒋管区的外国人”、“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等等都列入“读者”之列，而且把这些“读者”说成是“报纸的主人”，要无产阶级的报纸为他们服务，说这是记者的“唯一任务”。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让那些被打倒的阶级，被赶走的帝国主义势力重登我国政治舞台，重新骑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

反革命修正主义们吹嘘他们“博爱”，其实他们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点也不爱，而且恨得要命。他们心目中的“读者”，根本没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影子。一九四九年，刘少奇在天津就曾酸溜溜地埋怨《天津日报》“对工人很好”，“对资本家不好”，说这是“不妥当的”。陶铸也说他对反映工人、农民忘我劳动事迹的工农业动态“从来是不看的”。这个公开同情反革命分子“处境可怜”、“心情痛苦”的大野心家，竟然把《羊城晚报》的对象规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又把《广东画报》规定为“以知识分子为服务对象”，“高质量、高标准、高价格”的“高级”刊物，这就彻底揭穿了他们所谓“读者需要论”、“共同兴趣”的黑底。这一伙反革命魔法师，就是利用所谓“全民”，“共同”的概念，遮人耳目，偷天换日，把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暗里明里变换为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

林彪同志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全民观点，“表面上是否认阶级的。但是，实际上用这种形式来掩盖它阶级的面貌，阶级的愿望，阶级的政策，阶级的行为，便于欺骗群众。”“读者需要论”正是刘少奇、陶铸等一伙资产阶级代理人，为了篡改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阶级性，替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居心险恶地抛出的大阴谋。

陶铸和他的得力爪牙王匡还有一套骗人的鬼话，叫做“把党需要告诉群众的和群众需要知道的结合起来”，乍一听，似乎陶铸和王匡也在那里谈党的需要，其实，这又是一出大骗局！谁都知道，我们党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党和领袖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党和领袖需要告诉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知道的。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是党和毛主席需要告诉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不需要知道，必须由王匡之流来“结合”一番的吗？不，没有。陶铸和王

匡的骗局的破绽正在这个地方——他们把党和领袖的需要与人民群众的需要对立起来。实际上，由于他们心目中的群众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因而他们才会认为他们的“群众”的需要，和党的需要是格格不入的。

陶铸和王匡的虚伪之处还在于，他们讲党的需要完全是假的，而满足他们所谓“群众”的需要才是真的。如果不信，不妨翻开陶家新闻黑店的黑板样——《羊城晚报》的《工作纲要五十条》看看，在那里，你可以发现所谓满足“群众”需要，是他们考虑新闻报道的唯一需要，而且他们把这种考虑几乎渗透到新闻报道的每一个环节中去。请看：

“第五条：《羊城晚报》的宣传报道不仅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的需要与爱好，还要认真考虑用什么形式才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第三十二条：稿件是否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应该是《羊城晚报》选稿的一条重要标准，首先应该是选择头条消息的一条重要标准。”

“第三十三条：应当尽量避免从工作和业务角度来制作标题。”

“第三十四条：要使版面编排既中心突出，又丰富多彩，红花绿叶相配搭，适合广大“读者”多方面的需要。”

瞧！报道内容、形式、选稿、标题、版面都要满足他们所谓“群众”的需要。在这里，根本不提党的需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不提宣传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需要，不提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需要，不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而只有一个“需要”，这就是他们所谓“群众”（实为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羊城晚报》几年来正是按照这一方针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从各个方面大放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的。

歪曲事实的“唯事实论”

多年以来，新闻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陆定一等人的“新闻即最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新闻即事实的综合”“事实第一性，政治第二性”等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奉为金科玉律，不准逾越半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还把这一套“理论”归纳为“客观、真实、公正、全面”八个字，作为新华社的报道方针。这些都是违背客观真理的反动谬论。

毛主席告诉我们：“在阶级消灭以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的客观报道是没有的”。陆定一的所谓“新闻即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却完全抹杀新闻的党性、阶级性，和资产阶级新闻学上骗人的“新闻定义”只字不差，其目的就是要混淆无产阶级新闻和资产阶级新闻的界限，从而为资产阶级重新占领新闻阵地大开门户。二十多年来，陆定一这一反动的新闻定义在我国新闻界流传甚广，许多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新闻观点，就是在这一反动新闻定义的掩护下，泛滥于新闻界，蛊惑人心，为非作歹。因此，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必须彻底批倒、批臭。

陆定一的“事实第一性，政治第二性”，实际上就是鼓吹反动的“唯事实论”。我们知道，作为观念形态的新闻中所反映的事实，包括自然现象的事实，并不是纯客观的事实，而是有阶级性的记者为了一定阶级的政治需要而选择出来、并经过采写编辑的，它本身便包含有阶级性和政治性。新闻中的“事实”和新闻的政治性根本不可分割。陆定一却硬把二者分割开来，胡说“事实第一性，政治第二性”，其目的就是要替资产阶级虚假的“纯客观”论调制借口，而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所谓“客观、真实”，正是为了掩盖他们一贯捏造谎言、欺骗人民的丑恶行径。

陶家新闻黑店对刘少奇、陆定一之流的这一套谬论，也奉为圣旨。《羊城晚报工作纲要》的新闻报导部分，开宗明义地讲“新闻就是事实的报导”，“事实胜于雄辩，用事实报道最有说服力，最容易为群众接受。”“一般的新闻都只能透过它所反映的事实，潜移默化地去启发和教育读者”。在这里，根本否定了新闻的党性、阶级性，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把所谓“事实报道”吹嘘得神乎其神，似乎有了“事实”就能上天下地，万事大吉。其实，这是陶家新闻黑店设下的又一陷阱。我们知道，新闻固然要求符合事实，但事实仅是新闻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正如毛主席教导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脱离了党的方针政策，忽视了无产阶级立场、观点，一个新闻记者就不可能对某种社会现象（即事实）作出正确判断，更不用说

拿“事实”去“启发和教育读者”了。而且，并不是所有“事实”都能教育读者，最能教育读者的也不是什么抽象的“事实”，而是客观事实所体现和印证的毛泽东思想。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散布的“唯事实论”和所谓“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方针，其要害在于使我们的新闻事业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而赤裸裸地去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拿《羊城晚报》来说，它不是大肆鼓吹所谓“事实报道”吗？我们不妨看看它“透过”什么样的“事实”去“潜移默化地启发和教育读者”：《羊城晚报》上曾经大揭所谓“社会阴暗面”，大登那些“在南方大厦买不到一把木梳”“跑遍下九路买不到一双合穿的皮鞋”的报道，攻击我们的商店“短秤渗水”，“欺骗顾客”，修补行业“乘人之急，漫天要价”，“轮渡误客，急得人抓腿蹬足”，“纸糊棉胎，气煞顾客”，叫嚷为“广货荣誉担忧”，“快给这家粮店驱邪治病”……。这些“漆黑一团”的描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现实”吗？不！这是对我国社会生活的严重歪曲和恶意攻击，刊登这些“事实”是为了“启发和教育读者”吗？非也！这是在极力煽动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新闻界反党分子的“唯事实论”，和胡风分子在文艺界散布的“写真实论”是一路货色。它们主张抽象地“报道事实”“写真实”，实质上就是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鼓吹歪曲社会主义现实，替那些美化剥削阶级、丑化无产阶级的大毒草提供“理论”根据。《羊城晚报》过去犯下的滔天罪行，就是这一套谬论的反动本质的最好说明。

两种不同的“指导性”

任何新闻报导都是有指导性的。问题在于：在阶级社会中，有两种指导性，不是无产阶级指导性，就是资产阶级指导性。无产阶级毫不隐藏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新闻的指导性就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此指导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林彪同志也指示我们：“办好报纸，要抓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抓军委指示的精神，抓思想，抓活的典型，抓活的经验教训。”

但是刘少奇和陶铸却千方百计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报纸的指导性，反对中心工作的指导和典型的报道。刘少奇1954年说过：“党指导工作主要不是靠新闻，而是靠电报文件。做新闻工作的人不要强调指导性”，1961年他又叫嚷报纸“联系实际不要那么紧”，“不要围着目前的实际转”。陶铸和王匡之流更把报纸有关中心工作的报道视为洪水猛兽，非置之死地不可。

其实，剥开他们的画皮，他们并不反对所有的指导性，只不过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指导性，主张资产阶级的指导性罢了。例如，刘少奇和陶铸都反对在报纸上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刘少奇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污蔑为“形式主义”“庸俗化”“社会强制”，亲自批准在报上发表苏修专家格则尔曼污蔑我国工农群众学习毛著的信件，但是他却在1962年强要报纸大登自己的黑《修养》。陶铸疯狂反对报纸登党的方针政策、公报决议，然而他那些放毒文章、反动报告（包括臭名远扬的《随行纪谈》），虽然又黑又长，他却要广东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非登不可。他们共同反对报纸刊登工农业生产成就，但与此同时，却煽动人们起来揭露社会阴暗面和工作中的问题，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这些都说明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用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政治纲领，“指导”我们的报纸，把无产阶级报纸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喊大叫。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陶铸给《羊城晚报》规定的办报方针：“指导生活”。什么是生活？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世界观的人，有不同的生活理想。在无产阶级看来，生活首先是阶级生活；最美好的生活内容，就是革命斗争，而“斗争就是幸福”（马克思）；雷锋、王杰等共产主义战士的生活理想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然而，陶铸却说：“生活是什么呢？生活的范围很广，所有人们日常衣、食、住、行、娱乐、打球、看戏、旅行、休息等等，都属于这应予指导的生活之列。”这完全是一套资产阶级的“生活”观。

陶铸要报纸怎么样去“指导”他们所谓的“生活”呢？陶铸和王匡在大毒草《面向群

众》中给我们举出三个例子，作为报纸“指导生活”的样板稿件：一是京汉线塌坡，火车不通，报上应发消息；二是下雨太多，蔬菜缺少，报上要写稿件解释；三是搪瓷厂生产搪瓷饭盒，报纸要报道上市消息。原来这就是陶铸、王匡的“指导生活”！他们企图用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革命斗争，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而钻到所谓衣、食、住、行问题中去，忘记了阶级的国家的大事，而任由资产阶级猖狂进行复辟活动。陶铸和王匡的“生活指导”也就是鼓吹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和铁托的“福利国家”的修正主义货色，用这些“物质刺激”的“和平演变”手法，把我们国家拉向资本主义，把人民群众“指导”到旧社会的火坑中去。

腐朽的“新鲜”

在刘修黑司令部和陶家新闻黑店的修正主义破烂中，还有一个所谓“新鲜论”的黑货。他们大肆鼓吹什么报纸和新闻报道的内容要“新鲜”，反对“不新鲜的新闻”，胡乔木咬文嚼字地说过：“报纸的内容要求新鲜，办报圣之时也”。陶铸和王匡在《面向群众》这篇大毒草中说：“报纸的新闻报道有强烈的时间性，它要给人一种新的感觉。”《羊城晚报工作纲要》上更露骨地说：“《羊城晚报》新闻报道要新鲜……只有新鲜的事情才能成为新闻的题材，才为广大读者所关心和感兴趣，才能成为有价值的新闻。”《羊城晚报》的三反分子杨奇为了实现陶铸和王匡的黑指示，1961年到1962年，在报社内大张旗鼓地搞了近一年时间的“攻新字关”，杨奇本人还写了一篇《从“新”字着手改进新闻报道》，把“新鲜”吹捧成新闻报道的“关键问题”。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陶铸和王匡之流所鼓吹的“新鲜”，到底是什么货色。

陶铸在谈到《羊城晚报》的新闻报道时，说：“别的报纸没有抓到或者没有抓的，而问题又是重要的、新鲜的，我们就要着重把它抓住。”（“对《羊城晚报》工作的指示”）

原来陶铸的所谓“新鲜”，就是“出奇制胜”“标新立异”，就是“独家新闻”，也就是上海新闻界的右派分子当年鼓吹的那套“人取我舍，人舍我取”的破烂。我们要问：

“别的报纸”，即我们的党报，不报道或不允许报道什么呢？无非是那些对人民革命事业不利甚至是反动的东西，而陶铸在“新鲜”的幌子下，强要我们的报纸贩卖这些货色，这不是赤裸裸暴露了陶铸的“新鲜论”的反动本质吗？在陶铸的黑指示下，羊城晚报当年也的确是这样做了。它以“敢于”刊登党报不允许刊登的各种低级趣味、充满毒素的新闻和文章，而臭名远扬全国；它借开展批评为名，疯狂向社会主义进攻，为敌人提供反共弹药，在全国报纸中“首屈一指”，因而受到旧中宣部一小撮走资派的“重视”，要《羊城晚报》总结它的放毒经验。因此，陶铸的“新鲜”，就是要报纸公开放毒。

陶铸和王匡在《面向群众》这篇大毒草中还露骨地说：“辨别新(鲜)与不新(鲜)，应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尊重群众的需要和群众的想法，不能主观主义”。他们举例以说明之：益丰搪瓷厂生产了一批市面上缺乏的搪瓷新产品，如果写一条新闻，说明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种新产品，就是一条“好消息”，但是，如果记者去报道益丰搪瓷厂工人如何鼓足干劲，改进方法，增加产品，这就不很“新鲜”“不象前者那么吸引人了”。

同一产品，写工人如何鼓足干劲，改进生产，这就叫做“不新鲜”，报道这种产品上市，才叫做“新鲜”，这种论调听起来也许有些骇人听闻，然而这就是陶铸王匡当年反复叫卖的“狗皮膏药”，就是《羊城晚报》在“攻新字关”中强要编辑记者、通讯员执行的报导方针。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羊城晚报》还发生过一场名曰“两条猪的消息”的争论：有两条消息，一是养猪生产增加，一是生猪上市，本来都是按照所谓“指导生活”方针组织的报道，然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奇等人犹不满足，还要特别强调“生猪上市”消息才是“最新鲜”“群众最关心”的，而养猪生产增加则是“不新鲜”“群众不大关心的”。这些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新闻观点，充分说明陶家新闻黑店的大小头目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立场上，仇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勇劳动，仇视社会主义建设，而一心要贩卖资产阶级腐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贩卖“吃喝玩乐”的卑贱的人生哲学，用“软刀子割头”，推行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们所谓的“新鲜”，其实是资产阶级最腐朽不堪的东西，是臭气熏天的“狗屎堆”。

《羊城晚报》曾经根据这个反动的“新鲜论”，大搞庸俗不堪、离奇古怪的“新闻”，什么“某茶楼增加新式美点”，“一批海鲜上市”“大象结婚”“疯牛闹市”……在报上大肆宣扬，刮起一阵又一阵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

尤有甚者，陶铸王匡之流还利用所谓“新鲜”这根狼牙棒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他们竟敢拒绝刊登日报刊登过的重要文件，理由是“不炒冷饭”。甚至象“毛主席在莫斯科的讲话”、“周总理在苏共二十二大会议上的发言”这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他们都敢以“无需重复”为理由，拒绝刊登，真是狗胆包天，罪大恶极！

王匡和杨奇之流，为了扼杀社会主义的新闻，还蓄意歪曲新闻的时间要求，宣扬陆定一的“新闻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谬论，说什么“新闻就是当天、昨天发生的事实”，“某工厂勤俭办厂十年，某车工七年不出废品，都没有新闻契机，实际上是‘旧闻’，是‘历史故事’”。杨奇甚至公开按照“人咬狗才是新闻”的腔调，说什么“某学校如果有一位仪器保管员，多年以来未损坏过一件仪器，这还未构成新闻，如果有一天他不小心打烂了一件仪器，那就构成新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万变不离其宗，其矛头始终对准工人阶级，一心要把那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反映工人阶级英勇劳动的新闻一棍子打死，而让那些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放毒“新闻”，独占我们的报纸。

毛主席早在1957年5月就深刻批判了新闻界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

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彻底剥开了所谓“新鲜论”等反动新闻观点的画皮，深刻指出了它们的反动本质。人们可以清楚看到，陶家新闻黑店的所谓“新鲜论”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的一个集中写照。陶铸、王匡、杨奇等人正是按照资产阶级新闻的样板，从内容到形式，从方针到表现手法，全面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实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

“知识性”的背后

新闻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向打出“知识性”的黑旗，鼓吹在报纸上介绍“各种各样的知识”。

他们鼓吹、散布的所谓“知识性”，就是要用那些封、资、修的黑货来毒害人民，这一点已经很清楚。然而，“知识性”的反动本质还远远不止于此。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早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就阴险地说过：“报纸要登各种文章。首先要登各种知识性文章。重视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观点如无知识为其基础就空了”。一九六一年年吴冷西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把这一反动观点发展成“新闻的作用主要是给人们以知识、首先是当代社会生活的知识”。陶家新闻黑店的打手杨奇对这一反动观点视如至宝，到处宣扬，而且补充、发挥成：“新闻的作用首先是给人们以现代生活的知识，新闻的其他作用，例如指导斗争等，应该在传播知识这一基础上进行”。

他们转弯抹角地说了这一大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这伙资产阶级代言人都是企图把“知识”凌驾于一切之上。按照他们的逻辑，“知识”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党的方针政策，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报纸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务，统统都要隶属于他们的所谓“知识”，向它让路，以它为“基础”，不然一切都是“空的”。我们知道这就是苏修“技术高于一切”的修正主义谬论的翻版。

这样一来，报纸最中心的任务就不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而是所谓“传播知识”了；报纸的主人就不是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而是那些当前还掌握一些知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办报得“首先”依靠他们，以他们为“基础”，由他们来挂帅，这是公然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篡夺无产阶级报纸领导权制造理论根据。

按照这一伙人的逻辑，何止是办报要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国家一切工作的领导都得让给那些“知识专家”。“三家村”的邓拓不就公开地提出“欢迎‘杂家’”的口号吗？邓拓一九六一年在《燕山夜话》中狂热鼓吹“知识高于一切”，要无产阶级政党重

视“有广博知识的人”，说什么：“现在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这是公开要我们党向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开门，让他们窃夺“各种领导工作”，最后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在“知识性”的幌子下推行的一条反革命组织路线。

南霸天陶铸正是按照这条“组织路线”来开设他的新闻黑店的。被称为“杂家标本”的秦牧，当上了羊城晚报的副总编辑；汉奸文人刘逸生因“知识广博”，当上了羊城晚报的编委，把持了《晚会》的编辑大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其具有某种“知识”，被拉进《羊城晚报》作者队伍，甚至被聘请为报社的“顾问”，参予党报的宣传工作。这是一幅多么使人惊心动魄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图景！

按照他们这种“理论”和“组织路线”，不用多久，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象苏联那样改变颜色，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阶级敌人的用心是多么阴险、狠毒啊！

結 束 語

修正主义的新闻观点，千变万化，归结到一点，就是要让地主资产阶级重登我国政治舞台，篡改无产阶级报纸的性质，篡夺新闻工作领导权，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我们无产阶级新闻战士，同全国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把修正主义新闻黑线彻底批倒批透批臭，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永远照耀无产阶级新闻阵地！

陶記《羊城晚报》兴亡史

——从一个黑样板看陶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

《红卫报红旗》编辑部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陶铸，虽然不学无术，却从他的反革命需要出发，深知控制舆论工具的重要性。他不仅有一整套和中外赫鲁晓夫一个鼻孔出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纲领，还亲自创办了一份流毒全国的《羊城晚报》（即后来的《红卫报》），作为实施他的新闻纲领的据点。《羊城晚报》从创刊之日算起的九年两个月又十二天的历史，就是陶铸利用这个舆论工具进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活动的罪恶史。看一看《羊城晚报》的兴亡经过，将大大有助于了解陶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真面目。

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把《羊城晚报》的兴亡史分作三个时期加以揭发和批判。

（一）一个从头烂起的黑样板

一九五七年八月初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是《羊城晚报》的第一个历史时期。这是陶铸筹办这张晚报，制定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报方针，并且付之实践，全面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历史。

胎死腹中的怪物与《羊城晚报》的出笼

陶铸的《羊城晚报》是一个从头烂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报纸的活样板。它是怎样办起

来的？为什么不早不迟，偏偏在一九五七年创刊？

一九五七年是不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我党整风的机会，上下串连，八方呼应，大举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非常注意掌握舆论工具的。当时，他们已经在北京控制了一张《光明日报》，在上海把《文汇报》推上了资产阶级方向。广州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不甘示弱，他们配合京、沪同伙的叫嚣，一面猖狂攻击党报，一面提出要掌握“鸣放园地”，在行动上则公开在资产阶级“老报人”中串连所谓“办报同人”，策划于茶楼密室。当年四、五月间，一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同人晚报”，在广州已呼之欲出了。情势非常明显，如果这张“同人晚报”一旦得逞，那就是说：京、沪、穗三地将各有一个资产阶级右派舆论工具，鼎足而立，彼此呼应，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右派舆论网。

面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这些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要求，作为右派大头头的陶铸简直喜形于色。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四日，陶铸已公开宣布“如果广州市能出版晚报……我也很赞成。”不仅如此，他“还要出版《蒋介石选集》”！陶铸要为复辟资本主义而放开手脚大做舆论准备的狼子野心，可谓暴露无遗了！

但是，形势的发展打破了陶铸和他的右派同人的梦想。

我们知道，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响亮的战斗号召：“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到了七月一日，毛主席又明确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一个雷霆万钧的反右派斗争，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展开了。

广州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同人晚报”，则在雷声隆隆的反右斗争声中宣告胎死腹中。

但是，正象一切反革命阶级都不会甘心情愿地走入自己的坟墓一样，陶铸也决不甘心让他的喽罗们拟议中的罪恶计划破产。就在毛主席指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后一个月左右，陶铸便公然利用他窃踞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地位，赤膊上阵，为那张胎死腹中的“同人晚报”招魂了。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陶铸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是千方百计地要维护资产阶级的。他的办法是给那个死胎披上一件所谓“由党来办”的外衣，以掩盖由资产阶级右派“同人”来办的过份暴露的面目，为的正是更好地维护资产阶级。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六日，陶铸追述《羊城晚报》的创办缘由时，就曾自供：“《羊城晚报》是在反右斗争以后，为了给大家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园地才办的。”这个自供，除了《羊城晚报》不是在广州地区的反右斗争以后而正是在反右斗争中创办的一点外，可谓直言不讳地招供了《羊城晚报》与那个胎死腹中的怪物的血缘关系。盖陶铸的所谓“大家”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

《羊城晚报》的筹备工作，是由陶铸经过他的“思想参谋”王匡（老牌右派分子、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批发给南方日报编委会的。一批牛鬼蛇神，如三反分子黄文俞（《南方日报》总编辑），三反分子李超（时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后兼任晚报第一任总编辑）当时已被开除党籍的贪污犯、三反分子杨奇（历任晚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副社长。一九五八年，王匡秉承陶铸意旨，经黄文俞、李超出面，重新把他拉入党内），陶铸的“黑秀才”江林（此人曾任陶铸秘书，后来任晚报党委、编委、秘书长等职），以及谋划“同人晚报”的新闻界右派分子郭维梓、反动文人刘日波等，就是筹备《羊城晚报》的骨干。

列宁说：“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陶铸的所谓“由党来办”的《羊城晚报》，居然物色了这样的人马来主持，事实上已经透露了这张晚报的实质了。

从八月初开始，经过不到两个月的筹备，陶铸亲自规定了《羊城晚报》的性质、任务、报名，以至每天的出版时间，并且在他的一再催促下，十月一日，《羊城晚报》就宣告出笼了。

“阶级斗争熄灭”论——指导《羊城晚报》的办报思想的“理论基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罪恶累累的陶铸《羊城晚报》，有一套完整的反革命修正主

义办报思想。指导这种办报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陶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陶铸这套从中外赫鲁晓夫那里贩来的“理论”，是直接同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同年四月十七日，陶铸在他所作的《广东省宣传工作会议总结报告》里，就针锋相对地胡说，“我国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

毛主席在这一年三月又指示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陶铸当然不是“不了解这种情况”，而是因为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维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益，总要千方百计掩盖阶级斗争的真相，以便于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猖狂的进攻。在上面提到的同一个报告里，陶铸便公然全面歪曲了毛主席提出的“两百”方针，抹煞了这个方针的阶级内容，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胡说什么“在学术文化领域里，什么主义，什么派别，什么论调，都应该允许它存在，让它齐放与争鸣。”陶铸直接提到了党报，他以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身份叫嚷什么“报纸搞得太单调不好，要多样性”，“要做到兼容并蓄”，“广辟园地，广开言路”等等。

上述陶铸的这些谬论，仅仅是“取其精华”而已，但也够了！这都是陶铸同中外赫鲁晓夫相呼应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陶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直接体现到《羊城晚报》的，是从它创刊的第一天起，就摆出了一副所谓“全民报”的脸孔。

依据陶铸的“指示精神”写成的《创刊的话》，毫无隐讳地说，《羊城晚报》的性质，不是党的机关报；《羊城晚报》的任务，是“着重考虑”不作阶级区分的所谓“知识界的需要”，为这样的“知识界”“提供……争鸣园地”；《羊城晚报》的读者对象，则是除了主要的“知识分子”以外，还包括“其他各方面的读者”……如此等等，同苏联赫鲁晓夫所鼓吹的，报纸是“真正的全民的讲坛”，何其形神如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候，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所谓“全民报纸”，本来就是天大的欺骗，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吹鼓手为了掩盖他们的丑恶的阶级面目而使用惯了一面破旗。《羊城晚报》的实践，再次证明了打着“全民”黑旗的这张报纸，彻头彻尾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工具。

同样是依据陶铸的“指示精神”写成并得到陶铸批准照办的《关于出版晚报问题向省委请示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已经提出：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重大文件发表时，《羊城晚报》“不必全文刊登”，只“发一消息放头条地位，报道此事”就够了。好一个陶铸的所谓“兼容并蓄”呀！所谓“什么主义……都允许存在”呀！陶铸为什么规定《羊城晚报》“兼容并蓄”了剥削阶级的形形色色的许多“主义”——无数封、资、修的大小破烂，却容不下金光四射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呢？《羊城晚报》创刊后的第二个月，便居然拒不登载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在莫斯科发表的重要讲话。而仅据一九六〇年一年之内的不完全的统计，光是封锁毛主席的政治活动的报道，为数即达四十多起！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说：“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按毛主席办报思想办报。”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最高准则。

最积极、最热忱地树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光辉的形象，报道毛主席的政治活动，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最光荣的任务。

然而，披着“全民报”外衣的陶记《羊城晚报》，完全一反其道而行之。它甚至在同一天版面上，大肆突出苏联赫鲁晓夫的狗屁谬论，而把关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报道放在次要位置上。这是陶铸和他的《羊城晚报》的不可饶恕的罪恶。

鼓资本主义之风，易社会主义之俗——一条“灭无兴资”的办报方针

《羊城晚报》出笼以后，从第一版到第四版，都呈现了群魔乱舞的资本主义复辟怪现象——解放前资产阶级黄色报刊上的“社会新闻”，沉渣再泛了。什么星期六晚的传呼电话，“有八成以上是一个青年男呼唤一个青年女，或是一个青年女呼唤一个青年男”的“男人和女人”的“消息”，居然登上报端。久已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大汉奸周作人的

下作，竟赫然在目。集封、资、修之大成的所谓“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的黑货，纷纷披挂出场。《羊城晚报》的“董事长”陶铸，不止一一寓目，还非常赞赏，还要提到“方针”的“高度”加以概括。这就有一九五九年九月的“八字方针”——“移风易俗，指导生活”的破门而出。

陶铸的“八字方针”的提出，首先是他在办报方针上猖狂对抗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大暴露。

毛主席指示我们：“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这就是说，报纸必须承担起指导工作的战斗任务。而陶铸，则一贯反对报纸承担指导工作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陶铸说过：“《羊城晚报》并不需要象机关报那样指导工作。灵活性还可以大些。”“八字方针”进了一步，公然用“指导生活”取代指导工作。

陶铸的“八字方针”，又是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新闻工作上的“发展”。在存在阶级区分的社会里，难道会存在一种没有阶级区别的什么“风”和“俗”，有一种不带阶级烙印的“全民”的“生活”吗？陶铸故意抽掉阶级内容的所谓“移风易俗，指导生活”，只不过是為了更大量地贩运资本主义黑货，利用《羊城晚报》这个强大的舆论工具鼓资本主义之风，易社会主义之俗，推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搞和平演变。王匡在传达陶铸的“指示”时，曾这样说：“生活是什么呢？生活的范围很广，所有人们的日常衣、食、住、行、娱乐、打球、看戏、旅行、休息等，都属于应予指导之列。”陶铸自己也说：“一张晚报，既有时事宣传材料，又有增知识、广见闻、提高文化的材料，以补日报之不足。人们吃了晚饭，看看打球、下棋等消息，至少也是一种娱乐，比天天逛街，打‘五百分’有意义得多。”（一九五九年十月）显而易见，陶铸一伙不但别有用心地把阶级斗争的内容从现实生活中排除出去，还要通过对打球、娱乐、衣、食、住、行之类的“指导”，把广大革命群众引导上资本主义道路，最后达到灭无兴资，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陶铸的“移风易俗，指导生活”出笼以后，他手下的一批黑干将如获至宝，立即全面贯彻到《羊城晚报》各个版面上去。陶铸爱不忍释的《五层楼下》充当了推行“八字方针”的急先锋固不用说，文艺副刊《花地》也由陶铸的“智囊”王匡出马，连篇累牍地“讨论”起什么“马路两旁摆花盘”的“风俗”问题来，借题发挥，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综合副刊《晚会》则在这时开辟了《周末扩大版》，居然“指导”起“各方面的读者”如何“吃西餐”。国际时事版也不例外，从此以纵谈海外“风俗”与“生活”为己任之一，兜售了不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

这里必须附带指出的是：“八字方针”的实质，接触到陶铸的新闻纲领的要害问题。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的另一批黑干将如丁希凌（漏网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历任晚报社长、党委第一书记）、杜导正（漏网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历任晚报党委第二书记、社长兼总编辑），以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队头目，就曾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惶恐万状，为保陶铸而不惜公然篡改历史，造谣说陶铸当年提出的不是“移风易俗，指导生活”的“八字方针”，而是“兴无灭资，移风易俗，指导生活”的“十二字方针”。这一篡改，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技，恰好暴露了陶铸和他的党徒的不可告人的黑心！

大致说来，《羊城晚报》第一个历史时期的经过就是如此。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羊城晚报》由广东省委移交广州市委领导前夕，已经成为流毒全国、臭名远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大黑报了。

（二）配合美帝苏修进攻的毒舌

从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到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羊城晚报》名义上移交给广州市委领导，这是陶铸极力保住这一反党宣传阵地，并且对无产阶级专政发动新的猖狂进攻的时期。

明舍暗保——如此“移交”给广州市委

《羊城晚报》全面推行陶铸的修正主义新闻纲领的丑恶面目在它的第一个历史时期里

已充分暴露，受到革命群众的尖锐批评。据读者来信等方面反映，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已经有革命教师、学生家长等告戒青年不要阅读这张报纸。革命干部中也有不少人议论《羊城晚报》的办报路线，认为存在问题。而顽固坚持其反革命立场的陶铸却视《羊城晚报》为掌珠，甚至公然抗拒党中央的指示，拼命守住这一反党宣传阵地。

一九六〇年冬，党中央通知各省压缩报刊的数目，并建议把各地市委的大型日报改为小型的晚报。按照这一指示，广东省委办的第二张报纸《羊城晚报》本应停刊。但是，陶铸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他亲自主持的讨论报刊调整问题的会议上，却力保《羊城晚报》。他不让别人先开口，自己首先表示态度说：“晚报很有读者，我看不要停掉了吧。”“可以把《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合并，移交给市委领导嘛。”很显然，所谓“移交”给广州市委领导，不过是让陶记《羊城晚报》继续放毒的一个借口而已。这次会议之后，陶铸以广东省委名义批转了省委宣传部《关于〈广州日报〉与〈羊城晚报〉合并的意见》给广州市委，强调“办报方针不变”，“保持晚报的独特风格”，“版面和栏目划分……今后不要随便作大的变动”。这就更加明显，“移交”给广州市委办，乃是明舍暗保之计。挂着广州市委“机关报”招牌的《羊城晚报》，仍然姓陶，是陶记晚报。

后来，陶铸及其在中南局内的党羽，为了推卸罪责，总是强调《羊城晚报》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以后才由中南局接办（甚至说，真正由中南局办，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以后），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事实是，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陶铸仍然亲自掌握并通过他的爪牙王匡、杨奇等紧紧控制《羊城晚报》。一九六四年四月陶铸还赤膊上阵指挥《羊城晚报》改版，详阅试版报纸，从一版重大地方新闻到四版国际消息的标题，都一一作了具体“指示”，并且又一次表演他的“书法”，舞墨重写“羊城晚报”四只大字，更换报头字体，以“刷新版面”。

陶铸玩了这一手名弃实留的花招，对抗党中央的指示，继续出版并利用《羊城晚报》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策动了新的猖狂进攻。

五花八门的“批评”——给新社会抹黑

一九六一年前后，正是美帝苏修疯狂反华，国内牛鬼蛇神纷纷蠢动的时候。一九六二年夏天，美帝指使蒋匪帮阴谋窜犯大陆，国内地富反坏右更加猖狂。陶铸这时也赤膊上阵，他除了亲口发出大量诬蔑三面红旗的反动言论，和推行了个体所有制、包产到户等反动措施之外，还利用《羊城晚报》开展了反革命新攻势。

陶铸反革命新攻势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利用当时由于苏修破坏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我国暂时的经济困难，竭力给新社会抹黑。在一九六〇年，陶铸就已经叫嚷报纸要开展“批评”，要刊登所谓“缺点和错误”。到了一九六一年，他进一步鼓吹加强“批评”，鼓吹大谈“困难”，说什么“我看你们晚报就是要多搞些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说什么“现在议论的有关工业、手工业、商业、文教等各项工作，就有许多缺点，为什么报纸不提出批评呢？”等等。他亲自指示《羊城晚报》要报道“蔬菜供应紧张”、“火车不通”；并且亲自肯定《羊城晚报》对广州大沙头客运站、公共汽车、修补行业、三轮车的所谓“批评”。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两年中，陶铸谈到报纸要开展所谓“批评”的话，单有记录可查的就达十六处。

陶铸所鼓吹和王匡、杨奇之流所积极推行的“批评”是什么东西呢？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羊城晚报》发表了《大沙头客运站管理何其混乱》一稿，把这个广州最大的客运站描写成“没有领导的‘墟市’”，“人头拥挤，嘈声震耳。到处是：乱！乱！乱！”一九六四年四月《羊城晚报》的《五层楼下》发表的《市容之疮》的专栏，竟然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城市广州说成到处长着脓疮。够了！这是什么批评！这是卑鄙的诬蔑、恶毒的诅咒、疯狂的攻击！

在陶铸的指挥下，《羊城晚报》在这一时期里给我们的新社会肆意抹黑，除了集中搞所谓“经济生活述评”、“专题批评”之外，更大量的诬蔑攻击则分散刊登在每天的《五层楼下》栏内。单是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到十月十五日的一个月内，《羊城晚报》一版

就连续搞了十二次专题“批评”，攻击的对象遍及人民公社、工业、交通、邮电、商业、文化等部门。单《五层楼下》这一栏就给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提供了大量反动宣传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三年五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反动透顶的香港《星岛日报》转载了《五层楼下》的稿件一百六十七次，共约八万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陶铸及其爪牙假“批评”之名，给新社会抹黑，配合着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妄图动摇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他站的完完全全是反革命的立场。

对人民进行腐蚀毒害的麻醉毒剂

陶铸在这个时期利用《羊城晚报》发动的另一路进攻，是运用“软刀子割头”的办法，大量推销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对劳动人民进行腐蚀毒害，企图从思想意识方面动摇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恶毒手法，《羊城晚报》本来是始终如一地使用着的，但以这一时期最为突出。在这一时期里，广州市委和《羊城晚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仰承陶铸意旨，借口“经济困难、物质供应紧张”，要“转移读者注意力”，提倡大谈“文化娱乐”。结果，在这张报纸上，什么黄戏剧、黑电影、封建烂调、西方情歌、风花雪月、书画琴棋、游山玩水、怀古讽今的东西，简直象洪水一样泛滥。

在一九六一年两报合并后，《羊城晚报》办了一个《星期天》，每期由一篇游山玩水的东西挂帅，这是陶铸后来一再肯定的所谓“有人看的”、“古迹新探”一类东西。办了几个月之后，广东地区所谓名山胜水已经差不多写完，办不下去了，又改成《时事走廊星期天版》，仍然要求经常刊登陶铸所谓“坐游世界”的“国外游记”。在这些“游记”以及这个版的其他文章里面，大量美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被塞给读者。至于国内游山玩水的东西则仍然由《跃进中的祖国》这个栏继续贩卖。甚至属于子虚乌有性质的什么《玉堂春》中苏三蹲过的监狱和在它下面休息过的大树，也被当成胜迹大肆介绍。在消息报道中，什么“大象结婚”之类令人恶心的玩意也不断出现。一九六一年以前已经出现的《晚会》周末扩大版，和这个时期的《星期天》、《时事走廊星期天版》，都学着解放前反动的红绿小报的样子，套印成各种颜色，以吸引读者。

这一切所谓“转移读者注意力”的东西，究竟要把读者注意力移向哪里？陶铸一伙就是企图把读者引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绝路！

总结反党经验，企图流毒全国

在这一时期里，陶铸一伙除了利用《羊城晚报》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新的猖狂进攻之外，还干了一件包藏更大祸心的勾当。他们系统总结了几年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罪恶经验，到处推广，企图流毒全国。

一九六一年王匡写了一篇题为《面向群众》的文章，竭力鼓吹陶铸的“移风易俗、指导生活”黑方针，通篇黑文只字不提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报，而别有用心地要求记者“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诱骗新闻工作者“离经背道”。这篇黑文经陶铸审阅后送交北京《新闻战线》杂志发表。

一九六一年底，陶铸和中南局党内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指使《羊城晚报》总结经验，由杨奇主持起草了《羊城晚报工作纲要（草案）》六十条，把陶铸一贯鼓吹的“全民报纸”（读者对象包括“各阶层人民”）、“独特风格”、“移风易俗，指导生活”、“知识性、趣味性、多样性”、“开展批评”等，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些陶记黑经验，曾经通过全国晚报座谈会、交流经验等多种渠道，向全国其他报刊推销。

一九六四年三月，陶铸更亲自出马，接见《新闻业务》杂志负责人鲁西良，鼓吹他的办报经验。陶铸说：“人们说单晚报完全不行，我们采取一个‘折中主义’，既是晚报又是有思想性，看看行不行。”陶铸在这里招供得很明显了：他的所谓“晚报”是同“思想性”对立的。“思想性”是外衣，而“晚报”——资产阶级右派报纸是实质。陶铸全面地谈论了他贩卖糖衣毒药的“黑经验”，由鲁西良整理成一篇问答体的黑文，经过陶铸审阅定稿，准备

在《新闻业务》发表。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的罪恶企图未能实现。但至今为止，这一陶记办报黑纲领重要记录的原稿仍未追查出来示众，希望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注意。

陶铸这一罪恶活动，暴露了他的继续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这也再一次戳穿了陶铸黑爪牙的一个阴谋：他们妄图把一九六五年以前《羊城晚报》的滔天罪行同陶铸割断关系，而极力美化所谓中南局“接办”和陶铸“蹲点”后的羊城晚报如何“面目一新”的鬼话。

（三）疯狂的挣扎到最后复灭

从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是《羊城晚报》的第三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陶铸竭力为《羊城晚报》涂脂抹粉，乔装打扮，妄图掩盖他利用这张报纸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恶行，并且乘机捞取政治资本，更猖狂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而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宣告覆灭。简单说来，这个时期也就是陶铸创办与控制的《羊城晚报》打着“红旗”反红旗，垂死挣扎，以至最后被革命小将宣判死刑的时期。

所谓“中南接办”的黑幕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吹起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大反击的进军号。一九六三年，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开始了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

革命风烟滚滚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闻风发抖，但困兽犹斗。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陶铸在一九六四年间就下令把名义上交给了广州市委办的《羊城晚报》收回自己的手中——由中南局接办，同时恢复《广州日报》。只是由于他这时接到一本“桃园经”，热衷于推行中国赫鲁晓夫形“左”实右的四清路线，要下乡去“蹲点”，而且据说当时旧中宣部不同意广州办三张大报，中南局接办《羊城晚报》的事情才拖到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五年五月初，陶铸打电话给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说中南局要接办《羊城晚报》，同时恢复《广州日报》，问中央书记处意见如何。邓小平当即回答说：“象这样的事，你们大区自己决定就行了，用不着中央批准的。”邓修与陶修既然一拍即合，于是《羊城晚报》立即由“中南接办”。

七月一日起，中南局接办《羊城晚报》。陶铸为了更得心应手地制造反革命舆论，对《羊城晚报》这个摊子，可谓下足本钱，招降纳叛，拉来一批反革命干将。这里面有：一贯疯狂推行修正主义办报路线的漏网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丁希凌（任党委第一书记兼社长，后来专任党委第一书记），漏网大右派秦牧（此人是第二次到《羊城晚报》任副总编辑，这时已由陶铸指使王匡拉入党内，还充当了报社党委委员），陶铸的黑秀才江林，以及后来由新华社广东分社调来的漏网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杜导正（任党委第二书记，后来还兼任社长、总编辑），由北京《文艺报》调来的大右派黄秋耘，加上原来报社的大贪污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奇，等等。光是看这个名单，便可知道陶铸要这家报纸干些什么“好事”了。

中南局接办，陶铸亲自控制《羊城晚报》之后，频频指示要这家报纸“保持晚报特点，不要板起机关报面孔”，说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宣传要“慢慢来”，不要“概念化”，阶级斗争的宣传报道不得“大喊大叫”。很明显，陶铸把这张毒汁横流的黑报收回自己手中，企图稍加伪装，以便继续按照他的“八字方针”去“潜移默化”，鼓资本主义之风，易社会主义之俗。

中南局接办《羊城晚报》后的实践证明，陶铸不但利用这张报纸对革命群众实行资本主义的“潜移默化”，而且张牙舞爪地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更加猖狂的进攻。

反革命的“二月革命”和罪恶的“极盛时期”

中南局接办《羊城晚报》之初，陶铸就要这个报纸配合在他“蹲点”的农村大搞什么看电影不要钱之类的花样，颇为热闹地宣传了一阵子所谓“向农村文化大进军”。一时之间，“普及幻灯”、“文化轻骑队”、“农村文化宫”之类的报道充塞版面。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是，陶铸的所谓“向农村文化大进军”却是绝口不谈阶级斗争。他学着中国赫鲁晓夫赠送电影放映机的一套手段，大肆推销幻灯放映机。《羊城晚报》则大肆宣扬，好象一经幻灯机“进军”之后，农民觉悟便可提高，万事大吉了。

很显然，这个掩盖两条道路的斗争，抹煞阶级矛盾的什么“向农村文化大进军”，是公然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英明指示相对抗的。

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毛主席提出要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吴晗进行批判。随后，发表了姚文元同志《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重要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舆论准备阶段，从此开始了！

面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猛烈风暴，陶铸赶紧收起“向农村文化大进军”的锣鼓，举起“红旗”。于是，陶家《羊城晚报》进入了打着“红旗”反红旗最突出的臭名昭著的阶段；陶铸的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的两面三刀的表演，也越加淋漓尽致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陶铸到《羊城晚报》来“蹲点”。他的所谓“蹲点”，是带着一班大爪牙、黑秀才，在距报社百数十里之远的从化温泉的高级宾馆里住下来，实行“遥控作战”。陶铸宣称他要“当一个月总编辑”，躬亲“摄政”；后来还宣扬他的“二月蹲点”是《羊城晚报》的什么“二月革命”。

堂堂“中南最大”的头头，如此“关心”报纸，这里面自然大有文章。

所谓“二月革命”一开始，《羊城晚报》就全文刊登以陶铸为首的王匡、丁希凌等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炮制的中南局“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以及陶铸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所谓动员报告。接着，就连篇累牍地发表“名噪一时”的“三论”——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后来还发表了再论、三论）、《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观》和《论突出政治》等社论。这些东西，都限令中南各地报纸全文转载。中南局的“决定”，在《羊城晚报》发表之后，陶铸亲自打电话给彭真、吴冷西，要求把“决定”以中央名义批转全国，并在《人民日报》发表。

一贯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污蔑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和尚念经”的陶铸，居然抛出这样一个“决定”，他当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倡导者”吗？绝对不是。陶铸凭着他的反革命政治嗅觉，预感到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将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受到清算，便使出他的两面派的本领，佯装高举红旗，来洗刷自己。

一月间在武汉召开的中南局全体委员会，本来要讨论四清财贸等问题，陶铸称病不去，但会议中间，他却突然杀到，勒令会议把议程全部停下，连夜通过王匡把持的中南局宣传部草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汇报提纲”改为中南局的“决定”。这个出笼过程，就说明它是什么货色了。

所谓“三论顶峰”的社论，也是出于同样的需要而炮制的。这几篇东西，观点是剽窃来的，文字是大段大段地抄袭来的。陶铸的爪牙吴芝圃、王匡之流，居然吹捧之为《羊城晚报》的“老三篇”。陶铸也别有用心地说：“林彪同志提出‘当代顶峰’、‘最高指示’，我们用了‘毛泽东主义’，只有如此，才能概括。”陶铸这样大吹法螺，乃是梦想把自己打扮成同林彪同志一样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甚至还超过林副统帅的。

这些事实说明，陶铸的高举“红旗”不过是一场政治大骗局。

陶铸在《羊城晚报》“蹲点”一个月之后，总结他导演的这次“二月革命”时说：“经过一个月的试验证明，晚报是可以办好的。既不削弱晚报的特点，又有强烈的政治性。《羊城晚报》就是要办成这个样子，这是一条新的办报路子。”

这是什么样的办报路子？

“既不削弱晚报的特点”也者，就是坚持灭无兴资的“八字方针”；而所谓“又有强烈的政治性”，不过是披上一件“红色”的外衣。纵观这个时期的《羊城晚报》，第一版是

陶铸要弄反革命权术，而且继续疯狂攻击新社会的地盘；《花地》依然毒草丛生；“天天要开晚会”（陶铸“指示”）的《晚会》，推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毛泽东选成语解释》；体育版还是宣扬锦标挂帅；时事版继续贩卖知识性，还要按照陶铸的指示去做到“一条新闻也没有”。还须指出，正是在二月陶铸“蹲点”的“摄政时期”，《羊城晚报》刊登了大毒草《韶山的节日》，在四月份陶铸自称“垂帘听政”之时，又重登了一次。这篇文章恶毒地攻击和丑化我们的伟大领袖，受到批评，而陶铸却宣称“《韶山的节日》是这一个时期以来少见的好文章。”

经过所谓“二月革命”之后的《羊城晚报》尽管披上了种种“红色”的外衣，但依然封、资、修三毒俱全，而且毒性更为剧烈。陶铸所谓“新的办报路子”，乃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报路线。所谓“二月革命”的反革命目的也就十分清楚了：陶铸看到前一段把这家黑报稍加伪装的办法破绽百出，于是来一个“革命”，进一步为这家黑报乔装打扮，改头换面，在新的幌子下进行挣扎，一言以蔽之曰，打着“红旗”，大反红旗。

这个时期的《羊城晚报》，算得上是“极盛”时期了。陶铸为了扩大他欺世惑众的影响，下令加大报纸印数，发行达到三、四十万份。这样一来，涂抹了层层“红色”的这家黑报，流毒更广了，陶铸的罪恶也就更大了。

对抗《通知》——弃车保帅——杀人灭口

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支持下，炮制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汇报提纲》。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陶铸一接到这个《提纲》，立即贯彻执行，不遗余力。

这年四月，陶铸指使他的大爪牙吴芝圃召开一个“中南区学术研座谈会”，并亲临作了一个“机密”报告，大讲“纯学术”讨论。与此同时，在《羊城晚报》开办一个《学习周刊》，由王匡主办，热热闹闹的“讨论”起“学术”来了。充斥在《学习周刊》版面上的，是大批关于什么“清官”问题、“道德继承”问题，“让步政策”问题之类的黑文章。这个周刊的“编者按”在提到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大毒草时，大声疾呼要求学术理论工作者多写“学术讨论，学术批判”的文章来“参加讨论”。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指出，彭真的《汇报提纲》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陶铸所干的，正是这种突出资产阶级政治的勾当。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示在全国广播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发出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进攻的号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毛主席在《通知》中指出：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陶铸就是一个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要清洗他这样的人。当然，陶铸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使出了一切手段，来保他自己蒙混过关。推出几个反动文人、反动“权威”来假批判一下，以便自己在这样的烟幕中逃之夭夭，这是陶铸垂死挣扎的一个手段。《羊城晚报》副总编辑、漏网大右派秦牧，便是陶铸抛出来“批判”的对象之一。六月初，秦牧在《羊城晚报》上被点名“批判”了。由陶铸控制的中南局书记处精心炮制的编者按语，把陶铸及其爪牙王匡、丁希凌、杨奇等一伙在《羊城晚报》犯下的滔天罪行，统统让秦牧一个人担当起来。秦牧固然罪该万死，但是陶铸以及陶家其他爪牙的罪责又岂容推脱？革命群众立即揭露了这出丢车保帅的丑剧。

在羊城晚报社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群众，是陶铸为了保自己而

使出的另一个手段。陶铸是个什么货色，一张《羊城晚报》表明清清楚楚；他对《羊城晚报》的黑指示，他在《羊城晚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尤其明显。羊城晚报社的革命群众，通过对《羊城晚报》的揭发，必然会揪出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者。陶铸对此怕得要死，便指使他的爪牙在羊城晚报社制造法西斯恐怖，实行杀人灭口。陶铸的爪牙吴芝圃等宣称，羊城晚报社是“卧龙藏虎之地，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要“层层剥笋”地“上揪下扫”。顿时，白色恐怖笼罩羊城晚报社，成批成批的革命群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反革命集团”、“牛鬼蛇神”、“右派”、“黑帮红人尖子”，等等。谁敢于怀疑陶铸及其爪牙，就围剿谁。他们以为，这样一来，群众的口便可以封住，陶铸便可以安然过关。这条杀人灭口之计，何其毒也！但是陶铸又那能一手遮天？他越是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就只能越是清楚地暴露他的真面目。

宣 判 死 刑

一九六六年六月，陶铸已由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荐到中央，窃踞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位。这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到处吹嘘他自己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宣称他所控制的中南局是“坚决跟主席的”。陶铸在羊城晚报社的爪牙赶忙响应，无耻地歌颂陶铸“是主席的亲密战友”，甚至喊出“中南局万岁”的口号，真是混蛋透顶！

陶铸虽然到了中央，他的黑手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羊城晚报，使之成为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正是这家《羊城晚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陶铸指使派出的工作组评功摆好，吹捧陶铸控制下的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公开镇压革命小将点革命之火的革命行动。旧帐未清，又欠新债，革命群众愤怒揭发《羊城晚报》的罪行，并且要求封掉这家大黑报并清算它的罪行。

老奸巨滑的陶铸，深知他一手创办、号称“第一张大型的社会主义晚报”的《羊城晚报》罪恶累累，如不及早谋划，势必东窗事发，到时他就脱不了身。于是，他一边吹嘘他如何“抓”了一下，组织了几篇“论顶峰”的文章，办“好”了这家报纸；另一边，则是策划偷偷地毁尸灭迹，另起炉灶，办法是把它再度同《广州日报》合并，这次则要取消《羊城晚报》的名称。这个两面三刀的大奸贼，掩耳盖铃，还自以为得计。

七月间，陶铸指示中南局书记处讨论停办《羊城晚报》的事宜。八月二十八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要把《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合并，改名为《广州晚报》。想当日陶铸在砍掉《广州日报》的时候，对《羊城晚报》是何等宠爱，以至把它誉为“广东一宝”。如今为了消灭罪证，只好忍痛割爱，甚至要做到好象世界上从未有过一个《羊城晚报》一样。

可是，这时已“欲罢不能”了。在革命小将的冲击下，陶铸的停刊阴谋未能得逞，只好同意把《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陶铸在答复中南局的请示时说：“《羊城晚报》同意推迟一些时间并。题字可用过去写的字拼起来。”这个时候，陶铸还是念念不忘他自己的题字！

《羊城晚报》纵然改名换姓，但它是陶铸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这一点，并没有丝毫的改变。陶铸加紧推行停刊阴谋。十月六日，陶铸又与王任重商定，布置在报上点名批判王匡，把《羊城晚报》一切罪行的根子说成是王匡而不是陶铸（后来在准备公开批判杨奇的见报稿件时，也是如此这般割断陶铸与《羊城晚报》的黑线关系），造成这样的舆论之后，便可在十二月底宣布停办《红卫报》，遣散工作人员。陶铸以为这样一来，他的狐狸尾巴便可以掩盖住了。这条“妙计”固然“机关算尽”，但是形势的发展，已由不得南霸天“我说了算”了。偌大一个中南局，居然找不到一个敢来红卫报社宣布停刊决定的人。由此也可以看出怀揣这条“妙计”的人是如何作贼心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革命的暴风雨涤荡着中国的大地，摧枯拉朽。陶铸这个修正主义坏蛋，当然逃不脱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北京大造陶铸的反，猛烈炮轰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在广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猛挥铁拳头，直捣陶铸黑窝《红卫报》，向陶铸发起在广州的第一次大冲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采取革命行动，封闭了《红卫报》。